

香港未来添新翼

——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丹

我们国家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，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。这些都是“变”的地方。我经常说，香港可以发挥“一国”之利、“两制”之便，有“一国两制”的双重优势。过去，我们是“超级联系人”，在贸易、资金流通方面我们可以联系好国内和国外。最近几年，我们做了新的尝试，发现并证明在创新科技方面香港也可以利用“一国”之利和“两制”之便，联系国外和国内，做到“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”。

同时，香港在谋划未来发展的时候，也必须考虑到“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”。国家所“需”，在不同时期不一样；香港所“长”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，这是“变”的部分。香港很小，但香港的“长”在于，我们自身有的优势可以贡献给国家，我们没有的可以尝试到外面去找。以创新科技为例，过去5年中，我们在外面交了很多朋友，也吸引了很多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、创新机构来港落户。这些机构来香港，其实是看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实力，将来可以和我们国家合作。香港有“两制”之便，国际化程度高，有普通话、粤语、英语“两文三语”的语言环境。所以我们要不断调整香港在“一国两制”下的功能，以在国家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贡献我们的力量。

记者：如何评价回归20年来，特别是近5年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？如何看待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？如何确保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？

梁振英：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，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新情况、新问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。要确保“一国两制”不走样、不变形，主要是要严格按照《基本法》落实“一国两制”，这就涉及全社会不同阶层、不同界别的香港市民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政党、各类公职人员不仅要全面、完整认识《基本法》这部宪制性法律的条文，也要理解当年（1990年）我们通过《基本法》各条文背后的初衷、原意。

记者：“一国两制”从科学构想到在香港成功实践，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回归20年来，香港“变”了什么，“不变”的又是什么？怎么理解和看待香港与中央的关系以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？

梁振英：香港能成功落实“一国两制”的原因，一是“一国两制”构想本身是科学、务实的。同时，在落实“一国两制”过程中，中央对香港各个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，把这个有高度创造性、科学性的共识，通过《基本法》条文落实下来。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，也已经体现在《基本法》条文中，香港的高度自治由基本法的法律条文具体规范，并不是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自治。

回归20年来，香港“不变”的是“一国两制”和《基本法》的实施。“变”的是香港经济、社会的不断发展。在国家高速发展

中，香港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，我们自己也应主动调整，使得香港能够不断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

目前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共同发展，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划。香港作为

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起5年前增加了约71%，这也是比较可观的增幅。

环保方面，香港的海港水质有所改善，在中环海边我们刚设置了钓鱼区，这充分说明水的质量比过去有所改善。空气质量也比过去有所提升，直接的体现就是蓝天数比过去增加了。

记者：香港未来最大的机遇是什么？您对香港的未来又有怎样的期许与展望？

梁振英：我对香港未来的社会、经济发展是非常乐观的。过去30多年，如果把内地的改革开放比作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的话，香港现在又插上了另外一只翅膀——就是粤港澳大湾区。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，金融服务、贸易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都是香港的强项，香港和整个大湾区发展互补性强，可以和内地配合得非常好。例如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决定在香港成立学院以外第一个创新中心。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，是由于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，同时香港实施与内地不同的制度。他们说得很形象，“在香港做创新是从0到1；然后再从1到100，因为深圳是全世界做模型最快的地方；接下来是从100到100万，就是批量生产，可以在‘珠三角’其他地方实现”。当时，香港还没有怎么注意到大湾区的规划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说法，香港确实与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互补性非常好。所以说香港长了大湾区这只新的翅膀。香港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，在未来三四十年里，通过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合作，可以获得很多事业发展的动力。

对香港来说，未来另外一个一个重要契机就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“一带一路”是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重大倡议，香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国际化城市，我们可以和内地的企业“并船出海”，我们也可以吸引海外企业通过香港到内地去。所以，香港把握好这两个重大机遇，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乐观的。

记者：请问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，香港如何更好发挥自身的优勢和作用？香港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如何定位，这些将如何真正改善和改变香港居民的生活，给他们带来好处？

梁振英：香港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各领域的经贸关系已经有良好的基础。比如在巴基斯坦，有香港公司供应中巴通道建设生产沥青所需要的设备。巴基斯坦等

沿线国家可能对香港大部分市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，但我们在这些国家已有业务关系，而且发展势头不错。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册子，列举香港的企业已经在哪些沿线国家做了什么，以及下一步希望能在哪些方面扩大和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关系。

香港与内地企业一起“走出去”互补性很强。比如内地企业在西欧进行机场、码头、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，不仅国际竞争力强，性价比也很高。而香港企业在这些设施的运营管理方面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好，不仅在内地得到认可，在国际社会也得到广泛认可。设施联通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“五通”中的重要方面，香港在这方面就可以发挥自身优势，和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“并船出海”。

另一方面是大家比较少谈及的，就是在民心相通方面香港也大有可为。香港有大量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，长期以来他们和其他国家包括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有着很好的交往。这些民间团体，不管是青少年团体、公益团体还是宗教团体等，我觉得都可以鼓励他们走出去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交朋友。

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未来一年多将迎来一个很重要的进展，港珠澳大桥预计今年底将全线通车。明年年底即将通车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，将把香港和整个国家的高铁网连接起来。从香港新界的东部，我们现在正在修一条公路，建设香港和深圳的第七个陆路口岸。总之，这一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非常多，而且有相当一批在未来一年会相继落成。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有6600多万人，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城市群，而且从经济结构来看，湾区城市的互补性很强。这11个城市间要做好规划，不仅是设施建设、土地利用等方面规划，还包括未来经济、社会发展的规划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课题。

大湾区为香港未来经济、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。现在到大湾区工作、定居的香港居民已越来越多。我大概一个多月前率团到大湾区的西部城市考察了3天。回来后我们大家都很一致的看法——大湾区现在的发展，不仅基础设施做得好，交通秩序、市政卫生等社会管理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，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所以，不管是生活方面，还是投资经营方面，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吸引力都很大。

河北省赤城县承担着国家级秸秆全量化综合利用试点项目。近年来，赤城县通过农作物秸秆项目的实施，大幅降低了森林、草原引燃事件的发生，提高了秸秆的附加值，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，使得农户增收、企业得利，同时还减少了环境污染，实现了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的三统一。

摸清底数，认识秸秆利用现状。赤城县有农作物播种面积63万亩，其中产秸秆农作物播种面积49.5万亩，年产秸秆约20万吨。长期以来，受落后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，秸秆收、储、运体系不完善，加之缺乏核心技术和环境保护意识，全县的秸秆资源没得到充分、合理的利用。每年全县数万吨秸秆露天堆积，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。

结合实际，分类破解秸秆利用难题。为了破解小秸秆带来的大难题，赤城县采取多向突破方式，一方面优先秸秆饲料化利用。引进金灿秸秆加工有限公司，采用“公司+村委会+农户”的产业化经营模式，示范带动大海陀、东万口、茨营子及周边14个乡镇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，专人负责秸秆收购及储存工作，并与收储点所在乡镇签订秸秆收购责任状，优先收购当地秸秆，保障农户秸秆销售渠道畅通。经过“农作物秸秆收购—集中储存—晾晒—粉碎压包成形”等环节，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本县养殖场或周边市县，实现公司与农户之间互相依存、互利互惠和农作物秸秆的循环利用。

另一方面，积极探索秸秆基料化利用。县里引进了河北康绿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采用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的产业化经营模式，示范带动云洲、独石口等周边乡镇农作物秸秆基料化利用，优先收购当地及周边乡镇收储点农作物秸秆。经过“农作物秸秆收购—集中储备—秸秆生产线加工—食用菌基料”等环节，实现了农作物秸秆的能源化利用率，在全县推广使用清洁燃烧炉具1万余套。

提供服务，完善秸秆利用体系。为了保障秸秆饲料化、基料化和燃料化的顺利实施，全县成立了12家秸秆加工企业，有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秸秆加工等大中型农机装备5700台。在全县18个乡镇建立了15个收储点，采用“种植农户+农业合作社+收储点”的运行模式，该模式将各个利益体通过市场化形式连接起来，实现了可持续发展。

小桔

本报记者

冯举高

通讯员

申贵飞

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
高端访谈

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前夕，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官邸接受了中央媒体的集体采访。他表示，本届特区政府过去5年中，在土地、房屋、扶贫、安老等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成效，他对香港未来经济、社会发展非常乐观，充满信心。

记者：如何评价回归20年来，特别是近5年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？如何看待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？如何确保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？

梁振英：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，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新情况、新问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。要确保“一国两制”不走样、不变形，主要是要严格按照《基本法》落实“一国两制”，这就涉及全社会不同阶层、不同界别的香港市民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政党、各类公职人员不仅要全面、完整认识《基本法》这部宪制性法律的条文，也要理解当年（1990年）我们通过《基本法》各条文背后的初衷、原意。

记者：“一国两制”从科学构想到在香港成功实践，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回归20年来，香港“变”了什么，“不变”的又是什么？怎么理解和看待香港与中央的关系以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？

梁振英：香港能成功落实“一国两制”的原因，一是“一国两制”构想本身是科学、务实的。同时，在落实“一国两制”过程中，中央对香港各个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，把这个有高度创造性、科学性的共识，通过《基本法》条文落实下来。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，也已经体现在《基本法》条文中，香港的高度自治由基本法的法律条文具体规范，并不是任何形式或任何程度的自治。

回归20年来，香港“不变”的是“一国两制”和《基本法》的实施。“变”的是香港经济、社会的不断发展。在国家高速发展

中，香港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，我们自己也应主动调整，使得香港能够不断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

目前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共同发展，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划。香港作为

传承华夏文明
引领绿色发展

第十一届中国（郑州）国际园林博览会

开幕
倒计时

100 天

中国·郑州航空港区
2017.9.26